• 专题：阿卡迪亚博物学 •

编者按：

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部著名文集《博物学文化》和《博物学世界》看，“博物学文化”已经成为标准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二十多年，博物（学）得到科学史、环境史、人类学、自然教育、科学文化、科学哲学、保护生物学、科学传播学、自然文学、生活史等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理由不完全一致。在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学科群中多数人挖掘博物学，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自然科学相近，可以锦上添花，补充正统探究的不足。但也有人认为，博物学之所以有魅力，恰在于它无法化归为自然科学；此时翻出古老的博物学有更大的野心：既看到了它与科学的相关性更看到其间的差异性。帝国型博物学迅速得到重视，多半因为它与自然科学接近，容易转化为正规科学史叙述；而阿卡迪亚型（田园牧歌型）博物学不大被重视，是因为它贴近生活而显得过于“肤浅”，比如怀特的《塞尔伯恩博物志》、梭罗的《瓦尔登湖》、格雷的《鸟的魅力》在科学史家眼中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如果考虑到“自然”高于“科技”，或者考虑博物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平行论”，将会有另一番景象。复兴阿卡迪亚型博物学有助于认清科技支撑之现代性的弊病，有助于重建一种适合天人系统持久生存的自然观、人生观、发展观。《自然辩证法通讯》广泛探讨科技文化的诸层面，重视硬科技理所当然，但自然辩证法并不等同于科技辩证法，科技本身并非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本刊重视博物学文化研究，已刊出了两个专题“帝国主义与博物学”（2019 年第 11 期）和“图像与博物学”（2020 年第 10 期）。本期刊出三篇文章聚焦于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将进一步扩展相关学术空间。第一篇讨论了与怀特类似的博物学家米特福德及其《我们的村庄》；第二篇讨论日本万叶博物学，它提供了一种感受、认知和体验自然的有趣方式；第三篇讨论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对于减少现代性风险的启示。

（专题策划：刘华杰）

玛丽·米特福德的村庄：性别视野下的阿卡迪亚博物学

Mary Mitford’s Village: Arcadian Natural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姜虹 /JIANG Hong

（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四川成都，610065）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for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摘　要：玛丽·米特福德延续了吉尔伯特·怀特为代表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传统，其代表作《我们的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性别视野下帝国博物学研究”（项目编号：21BZX127）。
收稿日期：2021 年 5 月 6 日
作者简介：姜　虹（1982–）女，重庆人，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博物学史、女性主义科学史。Email: jh–iris@hotmail.com

庄》是文学与博物学完美融合的又一经典之作，以她生活的三里口村庄为背景，描述了乡村生活和大自然。她博览博物学书籍，以博物学家的好奇心和诗人的审美观察、欣赏和描述身边的自然世界，对自然充满真挚朴实的情感，从中得到慰藉和快乐。她拒绝采用18、19世纪女性博物学普及者青睐的书信体写作，但《我们的村庄》让读者与其一道漫步乡间，同样营造了浸入式的体验。她有着传统的性别观念，谦逊地对待自然和学识，拒斥学术化的自然写作。米特福德及其作品表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女性的阿卡迪亚博物学实践在博物学文化、生态伦理观、自然写作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关键词：在地性　谦逊　亲切写作　博物学文化

Abstract: Mary Mitford followed Gilbert White in the tradition of Arcadian natural history. Her *Our Village* was another classic of nature writing afte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a hybrid of prose and natural history. Based on her experience living in the village of Three Mile Cross, *Our Village* described rural life and nature poetically and precisely. She extensively read natural history works, carefully observed plants and animals, sought solace, joy and peace in nature, and appreciated its beauty from a poet's perspective. She refused to write *Our Village* in letters, the "familiar format" favored by women popularizers of natural history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But her proses similarly created a sense of immersive experience for her readers, inviting them to ramble with her in the countryside. Her traditional gender ideology shaped her domestic role, her modest attitude to nature and her disgust of pedantry, and led her to use the prosaic writing, instead of an academic writing. Mitford and her work suggested that women's Acadian natural history were (and are now) pivotal in the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natural writing and ecological ethics.

Key Words: Locality; Modest; Familiar writing;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2.08.001

1789年，牧师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发表了经典作品《塞尔伯恩博物志》，他也被誉为阿卡迪亚型博物学进路的代表人物。[1]然而，这本书直到1827年才成为畅销书，（[2]，p.49）此时怀特的同胞——另一位阿卡迪亚博物学家玛丽·米特福德（Mary Russell Mitford）以她生活的三里口（Three Mile Cross）村为背景，已经出版了前两卷《我们的村庄》（*Our Village*），并着手第三卷的写作。米特福德以怀特的方式观察、记录和描述身边的乡村生活和自然，《我们的村庄》在《塞尔伯恩博物志》之后成为英国另一部备受推崇的自然随笔经典。和朝拜塞尔伯恩一样，不少读者和作家也慕名前往三里口，感受米特福德描述的乡村，如19、20世纪之交博物学家威廉·郝德森（William Hudson）就先后拜访了塞尔伯恩和三里口，为写作寻找灵感。（[3]，p.213）

米特福德是英国作家和剧作家，极少被当成博物学家。《我们的村庄》是她的成名作，收录的散文最初在1821–1822年《女士杂志》（*The Lady's Magazine*）上连载，1824年开始集结成书出版，到1832年总共出版了5卷，各卷分别再版多次，19世纪下半叶开始合为一卷发行。这套书在英美都非常畅销，连作者自己都很感叹"我的书如此畅销"，"第五卷《我们的村庄》在一个月前出版，首印第二天就销售一空，现在正印刷第三次"。（[4]，p.303、332）然而，和怀特《塞尔伯恩博物志》一样畅销并再版至今的《我们的村庄》在中国却鲜为人知。前者已有多个中文译本，怀特也是文学和博物学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而后者直到2016年才有了中译本，学界对其研究寥若晨星，仅有自然文学研究专家程虹探讨过。[5]

西方学界对米特福德及其《我们的村庄》有不少研究，基本上都将其当成文学作品，关注田园牧歌的乡村写作。本研究非常认同艾米·金（Amy King）的观点，她以博物学的视角，将米特福德与怀特相提并论，认为《我们的村庄》"不仅是一部乡村生活的社会史，也是一部未被认可的博物志……与玛丽·罗伯

茨（Mary Roberts）《我的村庄纪事：一部自然日志》（*Annals of My Village: Being a Calendar of Nature*）这种公认的博物学写作一脉相承”。（[2]，p.9）金提出了“虔诚博物学”（reverent natural history）的概念，更侧重于怀特和米特福德在地方性、重复性和日常性的自然观察中的虔诚态度，体现了19世纪一种更普遍性和宽泛的自然神学。①安·希黛儿（Ann B. Shteir）《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撰写了一部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女性志，囊括了将植物学与文学融为一体的众多女作家，对本研究也极具启发性，但她略微提到米特福德时也仅仅是因为她的家庭教师弗朗西斯·罗登（Frances Rowden）是其中一位这样的女作家，并没有将她本人纳入这部“植物学的女性志”里。（[6]，p.9、92）本研究同金一样，将《我们的村庄》当成博物学文本，但更强调它与帝国型博物学相对的一面，而不是自然神学。同时，本研究尝试将米特福德纳入希黛儿的植物学女性志，把她置于维多利亚大众博物学文化，探索《我们的村庄》所展现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脉络、文学与博物学的交织、对自然的情感，以及性别对自然书写的深刻影响。

一、漫步在阿卡迪亚博物学的小径

以怀特为代表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侧重观察、感受和欣赏”，不以猎奇、发现新物种、收罗自然珍宝为目标，用文学化的方式去描述自然，传达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批判工业化，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7]，[8]米特福德也是走在阿卡迪亚博物学小径上的人文派博物学家，她反复阅读《塞尔伯恩博物志》，深受怀特影响，“觉得自己已经读了五六遍，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杰作，但我认为就怀特先生而言，真理是他的法宝。他的描述营造了一种真实的氛围，我在其他作品就无法有这样的体会。”（[9]，p.186）米特福德博览群书，对自然的热爱让她阅读了大量博物学主题的书籍，知晓众多博物学家及其作品，怀特不过是其中之一。她主要的通信者之一、忘年交笔友威廉·埃尔福德（William Elford）是皇家学会和林奈学会的会员，博物学和文学、艺术都是两人书信里的重要主题。

比较米特福德和怀特的作品会发现两个文本的共同点：拒斥进步主义叙事；关注反复发生的日常琐事；既定的有限地域。[10]怀特每日漫步在生活的塞尔伯恩教区，观察身边的自然，而米特福德的脚步走遍三里口的每个角落，熟悉那里的动植物和一年四季发生的变化。她热爱这片乡土，热衷于观察日复一日见到的乡村生活和自然世界，她在《我们的村庄》里有意识地强调了这种在地性（locality），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阅读，她都陶醉于自己“封闭”的小世界：

> 这是我们自己的小小世界……学着去了解、去爱我们身边形形色色各具特质的人，一如我们学着去了解、去爱我们每天都要经过的树荫小径，与朝阳公地的每个犄角旮旯和每个拐弯，这是何等的赏心乐事啊！即便是在书籍中，我也喜欢某片封闭的地区……找一本奥斯汀小姐的美妙怡人的小说，到其中的乡间小村坐坐……与怀特先生一起在他自己的塞尔伯恩教区漫步，与那里的田野和灌木丛，以及栖居其间的鸟类、老鼠和松鼠们建立起友谊。（[11]，pp.59–60）

在这个再熟悉不过的村庄里，米特福德对每个角落的花草树木如数家珍，对自然的四季变换也了然于心，她在日记随笔里栩栩如生地描述这一切：一月覆盖着白霜的橡树、荆豆、黑莓、野蔷薇，还有寒风中的凤头鹱鹬和翠鸟；三月开始复苏的自然，长春花、忍冬和接骨木都有了花骨朵，野生树篱的植物群落里有报春花、丁香、紫罗兰、黄花九轮草、欧亚活血丹、

①金用了约翰·布鲁克（John Brooke）提出的“关于自然的神学”（theology of nature）以区别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金认为“关于自然的神学”是一种新的自然神学，将自然观察结果视为上帝在自然中的示范，而不是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观察者的信仰来自启示神学。

草莓、三色堇、金雀花等，这也是采集紫罗兰的快乐日子；四月里的报春花、常春藤、野风信子、五叶银莲花、欧石楠、黄花九轮草、三色堇、雏菊、酢酱草等等，不胜枚举。米特福德的自然漫步并不止于诗情画意的欣赏，她也像博物学家一样去观察动植物，有着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例如，“（酢酱草）耷拉下来的白色花朵，形状好像一朵雪花莲，叶脉上有紫色的条纹，美丽的三瓣形叶片卷成心形”。（[11]，p.118）她对蜻蜓羽化的发现不仅展现了这种观察能力，也展示了广泛的博物学阅读：

> 它们看上去像一束束的花，叶子乍一看颜色有点深，细看之下其实是透明的，上面掺杂着些湖蓝色或亮绿色的亮晶晶管状物。待凑近了再一细看，发现原来是几群蜻蜓，刚刚从蛹中变完形出来，薄膜般的翅膀湿漉漉的，依旧懒洋洋地一动不动。半小时之后，我们再回到那地方时，它们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见到的是它们的美业已完备，而活力尚未被唤醒的时刻。自那以后，我在宾利（William Bingley）先生①那本名为《动物传记》的非常有趣的书中看到过对这一有趣过程的相似描述。（[11]，p.136）

《我们的村庄》的自然描述主要是植物，也偶有动物观察。不管是这本书还是通信集里，她从未提到过捕杀或制作标本，而是倡导在自然状态下去观察它们，“在它（翠鸟）处于优美的天然自由状态中时看它，这才是唯一的观鸟之道”“美丽的小东西跑来觅食，慢慢克服它们的羞怯，抛开它们对人类的不信任，实在是令人由衷地感到快慰”。（[11]，p.84）对植物亦是如此，她可以为了一种植物不辞辛劳反复前往其生境：“我已经三顾国王桥（Kingsbridge）去寻找那种植物（睡菜）——其中两次完全白跑；但第三次我们找到了，花蕾和叶子都长得很好，所以我决定不再放弃这种植物”，她也详细描述了采集过程。（[12]，pp.151–152）

米特福德的博物学实践体现着她对自然质朴纯真的情感，从最平凡普通的事物中寻找快乐的源泉：

> 栖身在这等平静而又甜美的景致里，人重新又会变得像孩子一样无畏、快活、温和。在孩子的世界里思想是诗歌，情感是宗教；在孩子的世界里我们快乐而又美好。哦，真愿我的一生都能这样度过，飘浮在极乐而纯真的感觉之上，在宁静与感激中享受大自然赐予的寻常幸福。这样的幸福变得如此珍贵，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简单的习惯和有益身心的性情。（[11]，p.101）

这样的情感和心态既是她从生活的困苦中得到慰藉的法宝，也激发了她的写作灵感。就如她欣赏的诗人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他之所以那么富于创造性，就因为他善于在诗歌中表达最常见最简单的情感。（[11]，p.199）与怀特同时代的卢梭在践行植物学的时候热衷于非功利性的植物学漫步，拒绝将植物学当成“词语的科学”或者医药学，他的《植物学通信》影响了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众多的女性爱好者。[13]米特福德延续了怀特和卢梭的博物学传统，与那个时代大众植物学文化中的其他女性一样，欣赏、观察和描述着身边的自然世界。

值得一提的，米特福德“纯粹又真实的快乐”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纷乱狂热的伦敦作比较”。（[11]，p.100）米特福德一家在1820年家道中落后才搬到三里口，这里离雷丁和伦敦两座城市都不远，并非《我们的村庄》开篇说的那样偏远、与世隔绝。她时常前往伦敦，活跃在社交圈，她也有着广泛而频繁的通信网络，从文人、艺术家、博物学家到读者，不一而足。然而，三里口的田园生活与伦敦的喧嚣大相径庭，从伦敦回到乡下的她更加珍惜这样的宁静，“告别了那里的热力、光芒与喧嚣，投身到迷宫般的乡间，重新获得头脑的休息与心智的宁静，而这些在那个巨大的巴别塔里都是业已失落的东西”。（[11]，p.95）在沉闷的

①宾利，牧师博物学家，在19世纪初出版了几部广受欢迎的博物学普及读物，《动物传记》（*Animal Biography*）是最受欢迎的作品，其中一部《植物学实用入门手册》（*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Botany*）采用了林奈性分类系统。

糟糕天气里，她就会想起工业化带来的伦敦烟雾。（[11]，p.85、122）尽管她从未明确批判过工业化的弊病，但从她对伦敦和三里口的不同情感里，内心对工业化的厌弃不言自明。

二、亲切的自然写作

希黛儿指出，18、19世纪之交那几十年，英国女性普及作家喜欢用书信和对话的亲切文体写作，塑造母亲或家庭女教师充当导师角色，在家庭和日常生活的氛围中向青少年和女性传播科学。（[6]，p.115）米特福德《我们的村庄》并没有采用书信或对话体，本文认为她有意识地摈弃了这种写作方式，实质上却与书信和对话体殊途同归，延续了这种亲切写作的传统，与读者拉近距离，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与自然的亲近。

如前文所述，米特福德阅读了不少博物学家的作品，她极其广泛的阅读范围自然不会遗漏那个时代女作家写的和写给女性读者的普及性博物学读物。最强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她非常熟悉的几位女作家——和她关系亲密的家庭教师罗登、著名作家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和安娜·苏华德（Anna Seward）等，都写了不少文学化和普及性的博物学作品，被希黛儿纳入“植物学的女性志”里。

米特福德非常钦佩罗登的博学，欣赏她的作品，与她一起参加知名科学家的普及讲座，去图书馆，阅读古典文学。她在15岁时和罗登去读书馆，借了一卷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地球的历史和生机勃勃的自然》（*A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Animated Nature*），读完评论道：“它是一部女士的博物志，非常有趣，浅显易懂，完全没有专业术语，要知道这类书通常都会最为强调这些术语。”（[9]，p.27）罗登本人也是将文学和博物学完美融合的典型代表，她的作品《诗意的植物学入门》（*A Poe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Botany*）模仿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的《植物之爱》，用诗歌的形式普及植物学。米特福德也非常欣赏史密斯和简·奥斯汀（Jane Austen）两位女作家，她们对自然的热爱和观察是她认可和模仿的重要方面。史密斯将博物学知识融入到流行小说和诗歌中，写了多部文学化的普及读物，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新风格，如以对话写成《乡间漫步》（*Rural Walks*）、小说《年轻的哲学家》（*The Young Philosopher*）、诗集《十四行诗哀歌集》（*Elegiac Sonnets*）等。米特福德曾多次称赞史密斯对自然的细致观察，“散文和诗歌如同风景画一样描绘了漂亮雅致的风景，从她描述的树木花卉看，她非常精通这门学科，用词准确而生动”，史密斯“深切地热爱着自然”，米特福德将这种热爱与自己进行了比较，“我在春天漫步时也总是对自然充满情感”。（[4]，pp.256–257）（[12]，p.148）米特福德最喜欢的女作家奥斯汀对英国乡村的描述令她着迷，她宣称“要尽可能模仿大自然和奥斯汀小姐，像她一样，保持优雅的乡村生活；可能更下里巴人一些，恐怕会倾注更多的情感，少一些幽默”。（[4]，p.198）即使是米特福德厌恶的苏华德，与利奇菲尔德植物学会来往紧密，是该学会核心成员伊拉斯谟·达尔文的好友和传记作者。因此，米特福德必定对当时植物学文化尤其是女作家的植物学写作非常熟悉，也了解她们的写作风格，这也是她之所以选择散文随笔而不是书信或对话的文化背景。

书信曾一度是科学家们交流信息的重要方式，不少学术刊物都以书信的方式发表科研成果，也是作家们钟爱的写作形式。如希黛儿的研究所展示的，这种方式盛行于科学普及写作，尤其受到女作家的青睐。然而，在19世纪科学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下，这种充满情感、个性和文学化的写作方式却被职业科学家视为女性化的业余写作，有不少女性也跟随这种转变改变写作风格。（[6]，pp.228–232）米特福德一生中写了大量书信，被誉为“熟谙写信艺术的行家”，[5]她对书信这种写作潮流的变化非常了解，曾多次鲜明地表明自己对书信的看法。1824年，埃尔福德建议她将《我们的村庄》写成书信风格，她拒绝了这个建议，并辩护说：

我很喜欢您关于书信的观点，但坦白地

讲，那种形式是一种过时的癖好和偏爱，我非常敬重这种方式，也从中得到很多乐趣。但这本书不可能写成书信，这些描述都太长，而且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很难在真实的书信中呈现出来……我们现在可以把公众当作朋友，跟他们自由轻松地交谈……简言之，我亲爱的朋友，书信在现在更多为了建立友善的人际关系，而不像过去那样交流智识……公众读者——如我之前所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通信者和知己。（[4]，pp.179–180）

她非常自信地宣称，“当您看到《我们的村庄》时，您会明白我的观点，即散文风格要比一挥而就的书信更能与您产生共鸣。”（[4]，p.174）她认为书信应该是高雅的交流方式，自然地表达情感，俏皮而优雅，而不是精确却僵化的论文。（[9]，pp.148–149）她也不看好女性用书信讨论科学，把它当成是反感的女学究表现：

读她们的信需要一部词典，没有百科全书根本读不懂。她们写的主题，从地球到天空无所不包，她们会给你写关于彗星的论文，讲解大英博物馆的波特兰花瓶，或者早已灭绝的诺亚方舟动物。她们还会讨论气体和流电，圆柱体和壁柱，雌蕊和花冠，引用希伯来语，告诉你她们将要学习流体静力学。（[9]，pp.173–174）

尽管她坚定地将《我们的村庄》写成了散文形式，但延续了女作家们在传播博物学时所营造的亲切感，而且特意强调与读者的互动，让他们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感：“你们愿意陪我在我们的村庄里转转吗，可敬的读者们？路不是很长，我们且从地势低的那头开始，然后慢慢朝着山坡上走吧。”（[11]，p.61）她就像三里口村庄的导游，领着读者走遍每个角落，跟他们描述鲜活的乡村生活和自然。女作家安妮·里奇（Anne Richie）为1893年版写了很长的序言，开篇就对米特福德营造的这种亲切感大为称赞：“那质朴而友好的身影如此栩栩如生，那‘一如钟声之婉约鸣唱’般的声音如此清晰可闻，其热情而友好的问候之词如此令人欢愉，这一切使得我简直意识不到，我们之间的这种熟稔只存在于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她对三里口的描述是一种“真实又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实”（[11]，p.1、23）她与众多读者的通信也充分说明，她成功地营造了这种亲切感，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她是一个每个读者都可以与她进行亲切交流的作家，因为她的随笔读起来不像是散文，而是像一封写给你的来信。继她之后，没有任何描述乡村的作家能像她那样享有如此可靠而富有鉴赏力的庞大读者群”。[5]

三、家庭天使与谦逊的博物学家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家庭天使”代表了中产阶级理想的女性形象，她们顺从、被动、善良、优雅、纯洁、温柔、持家，是完美的贤妻良母，整日围绕着家庭打转，相夫教子，把家打造成一个温馨的港湾。米特福德出生在一个衰败的贵族家庭，父亲原本是医生，却无所事事、挥霍无度，败光了他和妻子继承的所有遗产以及女儿中的彩票，母女俩却从无怨言，依然对他充满崇拜和爱戴。米特福德不得不挑起重担，靠写作养家糊口，为这个家庭操碎了心。米特福德的愚忠秉承了女性作为“家庭天使”的完美设定，传统的性别观念让她选择忍耐糟心的父亲和困苦的生活，也影响了她的科学观念和自然书写的方式。

米特福德的通信集时常显露出她的传统和保守，她对父亲不吝溢美之辞，也不时直接表达她的性别观念。她自称“非常棒的管家，没有让人饿过肚子，没有让火灾发生过，也没有丢过钥匙”。（[4]，p.32）她将针线活称为女性“最有效的镇定剂，最能治愈女性的不安情绪，令其平静下来的东西”。（[11]，p.133）她是一位成功的作家，靠写作支撑起这个家庭，但这对她而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女性本来就不该赚钱养家——我敢肯定这一点——她们缺乏力量。然而，我不得不在春天写出一卷‘乡村故事’，同时我要继续写我的悲剧，争取在复活节之前写出来。”（[4]，p.284）从属于男性在她看来天经地义，她反对“将女性变成政客或哲学家”，认为“男人有统治的特权，女人

乐于服从他们”。（[9]，p.174）

米特福德的传统观念也无不体现在她对科学和博物学的态度和实践上。18世纪60年代，林奈简洁的植物性分类系统在英国站稳脚跟，极大地推动了大众植物学的流行，女性成为植物学文化重要的参与者。然而，林奈以人类社会的性语言去描述植物的繁殖器官却有悖于传统的性别观念，女作家们在普及植物学时往往会“纯化”林奈植物学。伊拉斯谟·达尔文在《植物之爱》的长诗中支持性系统，用色情化的语言描述了大量植物，他也成为植物学文化中备受争议的人物。在米特福德熟悉的几位普及植物学的女作家中，她与罗登和史密斯立场一致，拒绝达尔文露骨的描写语言，她也因此反感达尔文的支持者苏华德。罗登在写植物学诗歌时将道德教化融入青少年科学教育中，认可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及女性的从属地位和母亲角色，被希黛儿称为女性植物学文化中的汉娜·摩尔（Hannah More）。①罗登效仿了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植物学诗歌，却反感其直言不讳地描述植物的性，“对追求简单朴素的女性教育来说太不合适”，她选择回避了情爱描写，强调宗教、道德、家庭等主题。（[6]，pp.87–91）而米特福德喜欢的女作家史密斯借用《乡间漫步》中坦西夫人的角色，批判了女学究“满嘴都是花瓣、花柱和花丝”那些令人反感的术语，谴责女性卖弄学问、炫耀科学知识的行为。（[6]，pp.96–97）史密斯的这种观念与米特福德厌恶女性在书信里讨论科学（也包括植物学，见上文引文）如出一辙。

作为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朋友和传记作者，苏华德认为林奈的植物学语言并没有不适合女性阅读，除非是那些“认为孩子是从欧芹地里挖出来”或者“对两性作为动物繁衍的前提条件竟然一无所知”的女性。（[6]，p.36、45）米特福德谙习苏华德的书信和作品，读过苏华德写的《追忆达尔文博士的一生》（*Memoirs of the Life of Dr. Darwin*），（[14]，p.197）而且罗登也提到过达尔文，米特福德必定非常了解达尔文本人的作品以及他对林奈性系统的宣扬。她甚至在1814年一封信中直接谩骂苏华德是“利奇菲尔德的独眼瞎暴君，自以为他人也鼠目寸光；迂腐的狐狸精，冷血无情的造谣者：一句话，就是英国和文学界的女达尔文博士”。（[9]，p.294）还称她“极其做作乏味，卖弄学问”，是“穿着裙子的达尔文博士”“喋喋不休，华而不实”，写的东西“空话连篇却言之无物”。（[9]，pp.148–149）（[14]，p.29）一次次这样毫不留情的批判，她对达尔文和苏华德的反感可见一斑。然而，米特福德却很欣赏卡罗琳·赫歇尔（Caroline Herschel）在天文学上的造诣，自嘲跟赫歇尔相比“浅薄”“丝毫不懂科学”，但她更看重的却是“赫歇尔小姐了不起的自我牺牲精神”，认为“这是女人真正的荣耀”。（[4]，p.76）米特福德对史密斯、罗登和赫歇尔等女性的学识和科学成就的欣赏足以表明，她之所以这么反感苏华德只是反感炫耀学问的女学究作风，而且苏华德作为女性竟然坚定地支持达尔文有伤风化的诗歌，与家庭天使的谦逊和纯洁背道而驰，更是罪不可恕。

相比自己在文学上的造诣，米特福德对自己的博物学显得非常谦逊，只是把自己当成怀特的忠实读者，强调自己对自然的热爱，但“不是博物学家——虽然不乏这种爱好，但缺乏所必需的身体条件；我当然也和其他人一样有一双眼睛和一对耳朵，但让人忧伤的是，这些器官却很不完美，它们都不能帮我分辨大山雀和欧亚鸲的区别。尽管如此不幸，我在读怀特先生的《塞尔伯恩博物志》时还是抑制不住喜悦之情”。（[9]，p.186）如果比较《我们的村庄》和《塞尔伯恩博物志》就会发现，米特福德更加关注植物，她列举和描述了花园、乡野里众多的植物，但几乎没有用专业的植物学术语或植物的拉丁学名；怀特则以动物（尤其是鸟类）观察为主，会捕杀动物、剥制标本和鉴定物种。鉴于米特福德传统的性别观念尤其是对女学究

①摩尔，福音派保守作家，反对女权主义在女性教育和社会地位上的激进观点，坚持两性差异和阶级差异是一个安全社会的基本特征。

的反感，我们不难解释她的这种选择。在博物学几个分支里，植物学在18、19世纪被当成最适合女性学习的学科，它没有动物学的杀戮和解剖，也不像矿物学需要繁重的劳动，植物学成为女性参与最广泛的科学。米特福德谙习女作家的植物学写作和写给女性的植物学作品，也必然了解这样的趋势，她的老师罗登就曾写道“［植物学］能培养优雅的品位，朴素的性格和谦逊的情感”。[15]从她的通信集我们还可以发现，她并非只观察植物，而是对鸟类、爬行动物和昆虫等也很关注，前文中蜻蜓羽化的描述也能提供佐证。因此，她在《我们的村庄》中对自然的观察和描述以植物为主很可能就是有意识的选择。而她对林奈植物学术语和性系统的回避，从她对苏华德极为反感的言辞中也自然得以解释。

米特福德曾自谦地表示“关于植物学，我所知甚少”。（［12］，p.240）这在女作家的植物学写作中并非特例，对女性学识的担忧在当时非常普遍，得体的女士、炉灶旁的天使，才是被推崇的女性形象。（［6］，pp.74–75；p.245）米特福德选择以诗情画意的文学描述代替专业、枯燥的科学语言，也没有关心过植物的拉丁学名或热衷于异域新物种，而是强调从植物中得到的慰藉和快乐。这种谦逊态度的根源可能来自女性的传统观念，但却成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推动力，她们因此不追求在大自然中猎奇和攫取，满足于欣赏和观察身边的自然世界，从情感、审美、文学上去领悟大自然的奇妙，她们的自然书写搭建起文学与博物学的桥梁，感染了更多的人漫步在阿卡迪亚博物学的小径上。

结　语

在米特福德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囿于传统的家庭生活，能像男性那样远行探险的女性少之又少。她们以谦逊的态度去观察身边的自然，从自然中得到慰藉和安宁，带着诗意欣赏司空见惯的动植物。在阿卡迪亚型博物学这条路上，女性可能比怀特走得更远，因为她们将其融入到日常生活，成为情感和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程虹在总结女性的自然写作时指出，她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关爱、欣赏、和谐相处，而非控制、索取和强行主宰，自然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3］，p.90）

在探讨米特福德的博物学和自然写作时，除了以怀特为代表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和女性的植物学文化维度，还可以将其纳入浪漫主义自然观中去考量。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和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为代表的湖畔诗人，既汲取了博物学家的自然知识，又以诗人的目光凝视自然之美，他们的生态意识、地域感和伦理观影响了后来众多自然文学家。[16]值得一提的是，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活跃在湖畔诗人的圈子，有着浓厚的博物学兴趣，并将她细致的自然观察以日记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启发了兄长的诗歌创作。[17]虽然没有证据显示米特福德和多萝西相识，但她们有着相似的博物学实践和自然写作风格，并通过华兹华斯的诗歌联系起来，成为浪漫主义文化的重要力量。再如米特福德喜欢的女作家奥斯汀和史密斯，她们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却很少被纳入科学史或环境史的研究范畴。回到科学职业化和专业化前的时代，科学与艺术、文学常常交融在一起，无需有当今流行的“跨界”一说，我们只有打破科学与人文的界限，才能更好理解自然知识、审美、文学、伦理、宗教、性别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交织。

从当下来看，米特福德的乡村生活和自然观察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刘华杰在探讨博物学复兴对于未来生态文明的意义时提倡公众实践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不但对个人身心健康有好处，也开通了个体与大自然接触的新窗口（这是现代科学所无法提供的通道）；普通人也能如我们的祖先一样在自然状态下感受、欣赏、体认大自然，更容易把自己放回到大自然中来理解，保持谦虚的态度，确认自己是普通物种中的一员，确认与其他物种与大地、河流、山脉、海洋共生是唯一的选择。”[8]生态

环境恶化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女性的母亲角色常常让她们更加关注环境的变化，也更能影响下一代对待自然的态度。时下越来越繁荣的自然教育，女性从业者比男性占了更高的比例，例如2018年的一份调查问卷显示，女性比例高达63%，[18]她们对青少年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大。因此，沿着阿卡迪亚博物学这条小径，女性无疑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唐纳德·沃斯特. 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 侯文蕙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9–20.

[2] King, A. M. *The Divine in the Commonplace: Reverent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Novel in Britai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3] 程虹. 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4] Mitford, M. R. *The Life of Mary Russell Mitford, Related in a Selection from Her Letters to Friends*［M］. Vol.2. The REV. A. G. L'Estrange. (Ed.)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70.

[5] 程虹.《我们的村庄》——英国女作家米特福德眼中的大千世界［J］. 读书，2013,（1）：130–137.

[6] 安·希黛儿. 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M］. 姜虹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

[7] 刘华杰. 博物学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23（1）：37–45.

[8] 刘华杰. 论博物学的复兴与未来生态文明［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3）：76–84.

[9] Mitford, M. R. *The Life of Mary Russell Mitford, Related in a Selection from Her Letters to Friends*［M］. Vol.1. The REV. A. G. L'Estrange. (Ed.)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70.

[10] King, A. 'Searching Out Science and Literature: Hybrid Narratives, New Methodological Directions, and Mary Russell Mitford's Our Village'［J］. *Literature Compass,* 2007, 4(5): 1485–1503.

[11] 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 我们的村庄［M］. 吴刚 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

[12] Mitford, M. R. *The Life of Mary Russell Mitford, Related in a Selection from Her Letters to Friends*［M］. Vol.3. The REV. A. G. L'Estrange. (Ed.)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70.

[13] 姜虹. 卢梭的女性植物学［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 38（2）：80–85.

[14] Chorley, H. (Ed.) *Letters of Mary Russell Mitford*［M］. Vol.1. London: Richard Bentley and Son, 1872.

[15] Rowden, F. A. *Poe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Botany*［M］. London: Printed for G. and W. B. Whittaker, 1818, ix.

[16] 艾莲、郭晓燕. 湖畔派诗人：从博物学知识到自然写作实践［J］. 文艺争鸣，2018,（11）：169–176.

[17] 吴靓媛. 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英国自然写作传统中的多萝西·华兹华斯创作［J］. 社会科学研究，2018,（2）：188–195.

[18] 2018自然教育行业调查报告［OL］. https://www.sohu.com/a/300315813_256054. 2021–04–23.

［责任编辑　李斌］